

方音学通论

仓修良 著

增订本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014036348

K290
07-2

仓修良
著

方 名 学 通 论

增订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航

C171576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志学通论 / 仓修良著. —增订本.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675-1402-7

I. ①方… II. ①仓… III. ①方志学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5797 号

方志学通论(增订本)

著 者 仓修良

策划组稿 朱杰人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史 华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插 页 4
印 张 40.75
字 数 68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402-7/K·395
定 价 13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右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曰澗水直西流至瓜州
城北十餘里西南流二百廿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
南号為苦水又西行卅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
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附亭驛
南即向西北流至廉遠烽西北十餘里入沙州
獨利河水

右源出瓜州東南三百里流至沙州燉煌縣
東南界雨多即流無雨竭涸

苦水

名東河水東南流者二道

一名神農渠
一名陽關渠州

西北又分一渠北名都鄉渠又從馬園口分

一渠於州西北流名宜秋渠州城四面水

渠側流觴曲水花草菓園^族豪士流家

目足土不生棘鳥則無鷄五穀皆

饒唯無穠桑其水溉田即盡更無流

流

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馬車牛

大海道

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分州一千五百六十

里常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

依負水擔糧腹敗沙石往來困弊

烏骨道

右道出高昌縣界北烏骨山向庭州四百里

足水草峻險石穴唯通人任馬行多損

他地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

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馬

泉湖道

右道出交河縣界西北向慶月已西諸蕃

足水草通車馬

銀山道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

沙磧酒唯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山窟三院

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禪院一所

右在柳中縣界至北山廿五里丁谷中西

去州廿里寺其依山 排於巖跡階應塔

飛空虹梁飲漢巖壁絲氣叢林什

眼既切煙雲亦虧星月上則危峯迢遞

下輕溜潺湲寔仙居之勝地諒栖靈之

秘域見有名頌僧徒居焉

吳郡志卷一

吳郡 范成大 撰



沿革

吳古揚州之域也初周大王三子大伯仲雍季
歷季歷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大
伯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
季歷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號曰句吳
立為吳大伯自大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商
即封其後為二曰虞曰吳後十二世當周惠

汲古閣

毛子
正本

延祐四明志

提要

臣等謹案延祐四明志二十卷元袁楠撰楠
字伯長慶元人朱知樞密院事韶之曾孫少
為麗澤書院山長以薦改翰林國史院檢討
官累遷侍講學士卒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
追封陳留郡公謚文清事蹟具元史本傳楠
文章博瞻為一時臺閣之冠所著易說春秋

提要

太倉州志卷之一

柳州府通判州人桑悅著

賜進士第前監察御史知太倉州事棗陽李端校正

同知太倉州事懷安周明編次

沿革

太倉州在蘇州府崑山縣治東南三十六里卽古婁縣之惠安鄉按舊志云春秋時吳王於此置倉故名太倉又曰東倉悅按東溪楊諱云此倉或曰吳王湖之倉或曰五代吳越王之倉夫湖都廣陵不應置倉遠七百里外枚乘說湖太倉乃在海陵今泰州也若云錢氏之倉不惟去國都太遠且屢爲淮南所陷殆其邊境不可儲蓄據此爲春秋時吳王之倉無疑又曰東倉地居吳東益可信矣陳仲太倉事蹟以爲吳孫權結好

乾隆四十四年重修永清縣志在事諸人姓氏

監修

欽命工部右侍郎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加三級汪廷璵江南歙縣人
戊辰進士

主修

永清縣知縣周震榮浙江嘉善人
壬申舉人

同事

永清縣儒學教諭劉璵直隸平山人
庚寅舉人

永清縣儒學訓導宋宗葵奉天遼陽州人
生員教習

纂修

候補國子監典籍章學誠浙江會稽人
戊戌進士

首事

己卯科舉人劉格本縣人

修志姓氏

题辞

余始在弱龄，精治小学，好涉览乾嘉诸儒著述。稍长，读章实斋书，服其识议通达，足以矫当时学者溺于名物训诂之枉，自是卓然特立之士以补偏救弊自任者也。尝就其遗书各种，撮钞其精言要义而熟复之。自以为爱读章书者，莫我若矣。晚岁游历四方，与仓君修良邂逅桂林，其年方过四十，方任教于杭州大学。文质彬彬，蔼然可近。因与纵论学术，知其亦寝馈实斋之学，引为同好，相交益亲。后余数游杭州，得造其庐。观所纂述之文，充积几案。其于章实斋与《文史通义》，既有专著论列之矣。继是而治史学史，撰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以刊布于世。复从事方志学之研究，广搜博采，取精用弘，剖析源流，甄审得失，复为《方志学通论》数十万言。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君所为《方志学通论》将出版，属余为序其书，余观其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自来论方志者，皆不及此书之全备而精密。行见此书一出，沾溉无穷。今之新修地方志书者，又必人手一编，以此为津逮也。则君论述之功，岂可泯哉！余既服其难能，因书此以遗之，亦聊以志余赞叹之意云。

张舜徽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

初版前言

地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全国保存的各种方志有8500种左右，共11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为我们研究祖国的各地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土人情、自然灾害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著作形式，与其他的文体一样，绝不是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善，一出现便是一部完美的著作。它和谱学一样，都是史学的旁支，并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形成，乃至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方志学。因此，我们在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时，必须把它放在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进行探索，才能正确得出产生的原因，发现每个阶段不同的特点。关于这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提出，要把研究的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然而目前研究方志起源的某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脱离社会发展条件，抛开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重要社会因素，孤立地仅就某部书来谈起源，其结果自然不可能讲清方志的起源。学术思想是各个时代政治、经济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方志的编修自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方志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明显的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阶段性的原因。所以我们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必须密切联系当时社会的条件，否则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方志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因此，不仅要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且要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各个时期的特点和编纂方法，以做到推陈出新，为今天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服务。从方志的产生到方志学的建立，经历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还出现不同的名称，所记内容也是在不断变化，逐步丰富完善起来。这些变化显然都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各种学术文化著作又都总要为特定的时代服务，因而也就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我们研究方志发展史，必须密切联系有关社会条件，否则就讲不清各阶段的特点和名称、内容、体例的发展与变化，最多只能做些现象的罗列。

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性著作，也就是前人所讲的“郡县之书”。由于它具有舆地著作的一些特性，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封建时代的目录学分类，都将它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在史部地理类。当时方志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样分法是可以理解的。而目前研究方志的论著中，普遍存在着另一个倾向，即把历来公认的许多著名的舆地著作都纳入了方志的行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读史方舆纪要》等等，有的甚至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称为方志。这么一来，历史地理学就完全被方志学所取代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所以许多历史地理学家已经纷纷提出了批评。谭其骧先生1983年4月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年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已指出：“地方志不同于总志。地方志顾名思义是记载一个地方的事情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地方可大可小，大的一个省一种志，古代的大到一个州一种志，小的不管是一个县一个镇，也可以有县志、有镇志。尽管可大可小，但总而言之是一个地方一种志。因为是记载一个地方的，所以地方志简称就叫‘方志’。‘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总’的对立体。凡是以全国为记载对象的，就不能叫它地方志。清朝人编的《四库全书》，大家都知道，在地理类里头就有一部分叫总志之书，一部分叫方志之书，那就分得很清楚。凡是记载全国的，就在总志里头；记载一个地方的，就在方志里头。把各省的通志和府、州、县志叫做方志，这是很正确的，也是很科学的。可是这

几年，我看到不少地方出版的地方志通讯一类刊物上所刊载的文章，往往把总志与方志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搞地方志工作的，有必要把这两个概念分清楚。《禹贡》是《尚书》的一篇，《汉书·地理志》是《汉书》的一篇，因为没有单独成书，所以《四库全书》里头当然没有把它列为地方总志；因为它不是一本书，但是它的性质无疑是总志。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它不列在《四库全书》总志里头而不把它当成一部总志。各地的地方志都不应该追溯到《禹贡》、《汉书·地理志》上去。要把总志和方志分清楚。”^①谭先生的讲话很中肯，应当引起方志学界足够的重视。

方志的性质是具有“亦地亦史”的地方性综合著作，记载内容的多样性，就决定了它的性质既不是史，也不是地，而是介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尽管它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已另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在编修新志过程中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创新必须在总结旧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完全丢掉方志的特点而去创新，那编纂出来的也就不可能是方志。当然，社会主义时代编修的方志，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面貌，如果一切均依旧志体例、篇目，内容很少有时代气息，自然也就谈不上创新。从方志发展的历史来看，每个时代的篇目、内容，总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现在提倡要创立社会主义时代新的方志理论，编修新型的方志。但如果对旧志的发展演变和旧志的编纂理论一无所知，新方志理论从何而来？新方志又如何编修？没有继承就绝无创新之理，这是经典作家早已指出的。相反，我们对旧方志理论和编纂方法的探索、研究，目的正在于批判地继承，吸取其有益的东西，为编修新志、创立社会主义新的方志理论服务。

方志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我从事于中国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志既是史学的一个旁支，所以我对它要分点精力进行研究。60年代，我曾写过20余万字的初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部初稿连同有关资料和卡片全都丢失了，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在党中央领导的直接关怀

^① 谭其骧：《地方志与总志及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4、5合期。
参见谭其骧著《长水集续编》（第二版）所收《地方志与总志》，人民出版社，2009年。

下，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志高潮。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从1981年起，校、系有关领导要我给高年级学生开设“方志学”课，于是不得不重理旧业，从头做起。几年来又多次应许多省份和兄弟院校的邀请，为他们举办的方志讲习班、培训班讲课，所到之处，学员们都希望将讲稿印发。他们的热切求知愿望，使我深受感动。就这样，遂决心将自己对方志和方志学的看法、想法重新写成这部《方志学通论》。这样既解决教材之需要，又可供各地修志工作者参考。

要了解方志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是需要翻阅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方志著作的。但是，要大多数人做到这点比较困难，因为有许多方志只有在全国比较大的少数图书馆方能看到。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在书中尽可能多地抄录了有代表性的方志篇目。至于像敦煌发现的唐代图经，大家看到的机会就更少了。为了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唐代图经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故将三部唐代图经残卷全文附上。

我是在吾师黎子耀教授引导下进入史学园地的，而对于方志学的探索，又是受黎师的启迪。他在60年代初已经提出，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方志，是史学发展的一个旁支。从那时起，我就按此精神进行钻研。这次在重新撰写过程中，尽可能参考了所能见到的方志学界老一代的著作和新的研究成果，从中吸取营养，在此谨向先辈和同仁致以衷心感谢！当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于具有争论性的问题，一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限于学术水平和见闻，加之这又是一门新的学科，书中错误疏失，实所难免，衷心希望得到史学界特别是方志学界专家、方志编纂新秀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书中所有表格除一幅由阙维民同志代为制作，其余皆为小女仓晓梅绘作或复制，她并参与了定稿后的誊写工作。一氓老人在百忙中为拙稿书写了题签，当代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张舜徽教授撰写了题辞，还有许多师友为这部书稿的撰述提供宝贵的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此书能够顺利地出版，自然更要感谢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他们为我提供了出版条件，并为书稿提出了许多十分宝贵的意见，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仓修良

一九八六年春节于杭州大学

修订本前言

拙著《方志学通论》1990年出版，已经13年了。由于早已脱销，所以学术界许多朋友都迫切希望我能够再版。当然，对朋友们的美意我是很感谢的，但再版我必须进行修订，并且要作大的改动。因为此书从撰写开始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1981年我将《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书稿交出版社以后，在给高年级讲授方志学课的同时，就进行了《方志学通论》的撰写工作。1984年完成初稿，经过一年的修改，1986年初就将书稿寄给齐鲁书社，这是他们向我所约之稿。由于当时出版事业处于低谷，于是这部书稿在齐鲁书社一下子就“睡”了五年，直到1990年底才得以问世。

20年来，学术发展都在突飞猛进，方志学领域变化也非常之大，而许多内容我在研究上也都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隋唐五代的图经，这是方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通过对敦煌图经残卷的研究，完全可以肯定图经是一种什么著作。此前许多学者一直认为，图经是以图为主，亦有人说图经就是地图加文字说明。虽然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妥当，但是反驳的理由并不充分。尽管当时通过友人帮助，我已经得到敦煌图经残卷，但还没有时间进行深入研究。从那时起，我就将此内容作为研究课题提出，终因教课任务重、应酬文章多而一直提不上议事日程。我也曾和研究生商量，只要他们愿意研究撰写，我可以为之提供资料，帮助修改，成果是他们的，但他们大多也以太难而谢绝。直到2000年上半年，我去美国住了半年，去前带足了有关资料，集中精力总算将此问题搞清楚了。看到了图经的庐山真面目，修改过程中，自然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图经是一种什么样的著作。

拙著既然重点在讲述方志发展的历史，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事业自然也应当有所反映。对此，大家知道得较多的

自然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修志事业。这次修志工作不仅开展的面相当广，而且成书的品种和数量都创造了奇迹，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理所当然应当大书特书，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次修志，自然也不应当忘记，因为它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修志。虽然，后为政治运动所迫而中断，但我们在撰写方志发展的历史时，还是应当给它应有的地位。它代表方志发展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况且当时同样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指导下开展起来，而各地也同样是在有关政府组织下进行工作的，有方志小组制定的《新方志编修体例草案》和有关条例，真可谓一应俱全。虽然时间很短，其实已初见成效，修出了数以百计的县市志初稿。今天所能见到的有些志书，内容、体例也还相当不错，但一直不被人们所重视。所以这次修改过程中，我着意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将当时的修志过程写入其中，让更多的人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修志工作的概况，以便将来人们研究新中国修志事业时，不再将这一段修志历史遗忘！

修志界同仁都已知道，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已经开过，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动员并部署新一轮修志工作，这就是说新一轮修志工作已经开始。那么新一轮志书究竟应当如何修法呢？实际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副组长王忍之同志已经提出了具体要求，认为新一轮修志有两大任务，一个是“续”，一个是“修”，“这次修志应该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在上一部志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正、补充和续修，而不是摆脱上一部志书，紧接下去搞续修。他指出，“修”也是新一轮修志重要的、不应该忽视的任务，不能只讲“续”，不讲“修”。他提出新一轮修志的全过程是在上一部志书的基础上，“好的保留，错的纠正，漏的补上，长的精简，如果这些工作做好了，再加上时间上把它延伸，新的续上，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就完成得更全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部新的、更好的志书，既有最近一段历史的新史料，又有对上一部志书的提高、修正。这次修志应做到既修又续，不能偏废”。^①我觉得王忍之同志所提出的要求是非常切合实际的。因为第一轮所修志书中有许多应当写而没有写的内容，漏得实在太多了，这些漏并不是某个小问题的遗漏，而是整段的历史丢了。不少志书对民国时期的内

^① 王忍之：《在全国续志篇目设置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2000 年 7 月 26 日）》，《中国地方志》，2000 年，第 5 期。